

陈高春 著

语言 与辞书

长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人 可

封面设计：陈玉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辞书/陈高春著. -北京:长城出版社,1996.10

ISBN7-80017-319-4

I. 语… II. 陈… III. ①汉语-研究-文集②汉语-辞书
学-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663 号

语言与辞书

陈高春 著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政编码: 100832)

西安七二二六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75 印张 16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西安第一次印刷

定价: 13.20 元

序 言

笔者自知学养不足，故自从教 20 年来，除尽心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于治学一途，更一日不敢怠慢。长年青灯孤影，虽严寒酷暑，亦不至辍学。遇有所思，即行笔录，因得粗浅文字约 500 万言。然限于学力，无缘涉足高深学问，只得走学问家不屑一瞥的辞书之路，故能登大雅之堂者少。近 10 年来，身在军营，所悟良多，欲试图另辟新径，潜心军事文化学、中国军事文化史的探索。为将此前的努力作一小结，或则激励自我，或则就教方家，遂将零星所得择其要者稍加整理，勒为是编。

本书内容所及，有对语文学史的探讨，也有对古音学的思考，有对语法修辞的钻研，也有对辞书理论的阐述，故以《语言与辞书》名之。所录文字，或已发表，或为辞书序言，或系为研究生授课的讲稿，因非写于一时，各篇笔法自有不谐和处，为保持原貌，除更正明显错误外，一切皆仍其旧。

本书虽系笔者一孔之见，但对于语法修辞知识的普及，对于学习古代汉语的青年同志，对于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专家、学者，对于辞书编纂家，或许有所裨益。

陈高春

1995 年 9 月识于无极斋

目 录

中国语文学及其沿革·····	(1)
一、中国语文学的性质和内容·····	(1)
语文学的概念——语文学的性质——语文学的内容	
二、中国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4)
语文学的产生——语文学的历史分期(启蒙期、盛行期、中衰期、复兴期)——语文学的发展	
汉语上古音研究概述·····	(33)
一、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历史和方法·····	(33)
音类的研究——音值的研究——亲属语言的研究	
二、汉语上古音研究的成果·····	(39)
理解古今音异——划分上古韵部——考证上古声类	
三、汉语上古音的构拟·····	(49)
清代学者的认识——近代学者的做法	
韵学随笔·····	(52)
一、关于《广韵》的声母系统·····	(52)
《广韵》音系声母的考证——《广韵》的声母系统——《广韵》声母系统的分析	
二、关于“等”的问题·····	(55)
“等”的概念——“等”的产生——“等”的特点——“等”的流变	
三、关于重纽的问题·····	(58)

四、关于重韵的问题	(59)
五、关于汉语历史音变的规律问题	(59)
语音构造规律——语音演变规律——音变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矛盾统一——语音发展的通例	
六、关于“开、齐、合、撮”的来源问题	(64)
论《康熙字典》等书的注音及音义配合	(66)
论旧字词书的反切今读	(75)
《汉语音韵学著述考略》序	(87)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序	(90)
汉语语法修辞释疑	(95)
一、汉语语法释疑	(95)
汉语语法和语法学——语法意义——语法手段——语言的组合法则——语法单位——语法和逻辑——构词法和构形法——词素和语素——词和词组——词类和词性——划分词类的标准——汉语词类的古今差别——词的兼类现象和同形同音词——实词和虚词——名词的特殊用法——名词的重叠——名词的重叠和量词的重叠——动词和形容词——动词的特殊用法——自动词和他动词——形容词的特殊用法——数词的“二”和“两”——副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副词——能愿动词和副词——“没有”的语法功能——“是”的语法功能——副词修饰名词——“它”是人称代词——人称代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疑问代词的任指和虚指——疑问代词的使用——指示代词的使用——“其它”和“其他”——介词和连词——“或”跟“和”——“或	

者”跟“还是”——“及”跟“和”——“得”的用法——助词的时态和动态——“过”的用法——“给”的几种用法——“在”的几种用法——“被”的用法——“的”的几种用法——“了”的几种用法——“对”和“对于”——“对于”和“关于”——词组结构类型古今差别——连谓词组——多义词组的分析——多重词组的分析——复指说——施事和受事——述语和谓语——时地状语和时地主语——补语和宾语——结果宾语和对象宾语——动词充当定语——多项定语和多项状语——兼语句和双宾句——主谓词组作宾语和兼语词组作谓语——兼语句和连谓句——连谓句跟联合词组作谓语的句子——双宾句的特点——把字句和被字句——主语省略、主语残缺和无主句——复句和单句——多重复句的分析——联贯复句和并列复句——转折复句和假设复句——长句的“长”——句子语法错误的检查

二、汉语修辞释疑…………… (158)

修辞和修辞学——修辞和语言的三要素——修辞和逻辑——构成比喻的条件——比喻和比拟——借代和借喻——夸张和夸大——对比和对偶——对偶和排比——衬托和对比——构成层递的条件——排比和层递——排比和反复——反复和层递——反问和设问——设问句和疑问句——双关的特征——语义双关和借喻——双关和拈连——拈连和仿词

辞书与辞书编纂…………… (178)

上编：辞书与辞书学…………… (178)

一、辞书的概念及其含义·····	(178)
二、辞书的性质与特点·····	(180)
三、辞书的功用与评价·····	(190)
四、辞书的体系与类型·····	(193)
五、辞书学的概念及其含义·····	(196)
下编：辞书的编纂·····	(199)
一、辞书的选题·····	(199)
二、辞书的策划·····	(201)
三、辞书编纂的准备工作·····	(206)
四、辞书的编纂原则·····	(208)
五、辞书编纂的方法·····	(210)
古今同形词辞典·叙例·····	(223)
《古今同形词辞典》试写条目·····	(227)

中国语文学及其沿革

一、中国语文学的性质和内容

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而侧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样一门总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

在我国古代，语文学又称为“小学”，指教人认字的学问；西汉末刘歆《七略·六艺略》即标有“小学”一类¹。“小学”既是教人认字的学问，后来也就有称它为文字之学的。南宋藏书家晁公武说：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名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

（《郡斋读书志》卷四）

晁氏之说，本诸《隋书·经籍志》²。从此，“小学”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三者虽各有侧重，但相互间的界限是不十分明确的。

一般说来，语文学的研究，目的在沟通古籍，使今人能

读懂古代文献，因此，中国的“小学”又一向被认为经学的“附庸”。

语文学在清代又称为考据学。清末郭嵩焘说：

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黼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重刻《郡斋读书志》序）

这门学问以考证为中心，而尤重汉儒传注，因此称作“汉学”。又因为这门学问讲究实事求是，所以后来人又称它为“朴学”。

语文学通常也叫做传统语言学。陆宗达先生说：

传统的“小学分成了三个互相有分工又有联系的门类：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的总合，就是我国初具规模的传统语文学。（《训诂简论·一》）

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以文字为主，兼及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的形、音、义；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考证。而现代语言学则不然，它研究的对象是以语言为主，兼及其他；研究的内容是语言的内部规律，目的是科学地、系统地、全面地探讨语言理论，指导语言实践；研究的方法是描写、比较等多样化的。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清末以前，属于传统语言学，而且应该包括在语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训诂学是语文学的中坚，也是语文学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由于历史悠久，它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清末张之洞解释“训诂”二字说：

诂者，古言也，谓以今语解古语，此逐字解释者也；训者，顺也，谓顺其语气解之，此逐句解释者也。（《辘轳语·语学第二》）

可见，所谓“训诂”，不只是究明字义，还兼及于语法。训诂学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训诂学，就内部而言，包括了后来的文字、语音、词汇，甚至语法、修辞等；而外部，则与文献、校勘、目录、考据等关系密切；它们之间界限也是不易分清楚的。至明、清以后，训诂学逐渐形成为“小学”三类之一的独立学科，而语法、修辞等学科，却从训诂学中逐渐独立出来。就研究方式而论，训诂学又可以分为“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著”两类³。随文释义的注疏，指的是以解释古代典籍词义为主的传、注、笺、疏等，如相传为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南朝梁刘峻的《世说新语注》，唐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李善的《文选注》，清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通释语义的专著指的是将前人对字义的解释，按一定的方式编排出的字书，即后来所说的字典、词典，如《尔雅》、《说文》等。近人胡朴安先生说：

溯训诂之原始，当是七十子以后学者的传授，而训诂之发展，是在东汉古文家勃兴时代，贾逵、马融、许慎，皆是训诂学大家，而郑玄尤能集周秦两汉训诂之大成；唐之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亦能集魏晋南北朝训诂之大成；就是宋朝道学家，偏于义理之解释，虽不是正统之训诂，而亦是属于训诂之范围。至于清朝汉学家之著述，如正续《皇清经解》内所收，大半皆是训诂学。（《中国训诂学

史》自叙)

胡氏的话很能说明问题。

校勘学兴于两汉，昌于唐宋，盛于清代。典籍的校勘，是文字、音韵、训诂等的综合运用。为了鉴别古籍的真伪，学者们往往辨别字形，推求字音，审理字义，以求得古书的真实面貌。因此，校勘学也是语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语文学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即金石学。金石学兴起于我国北宋嘉祐（公元1056——1063）年间，后来的经学家往往利用金石学研究的成果来解释经典词义，如南宋朱熹《诗集传》中就多次引到北宋末薛尚功的《钟鼎款识》。至清代，金石学与文字学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出现了大量的金石文字学著作，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邢澍的《金石文字辨异》、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等。到了清末，由于甲骨文的出土，兴起了古文字学的研究。古文字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两途：一是拿古文字以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一是拿古文字以证楷书汉字的形、音、义。由此可知，这门学问实际上已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

二、中国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汉字数目非常多，形体又极其复杂，用它所记录下来的古人语言，即作为古典文献而保存下来的经籍，使人们阅读起来碰到很多困难；又由于时代遥远，字的形、音、义都有了变化，古书更不易被后来人理解。这就必须要有一批人去做研究和整理的工作，编出分析汉字形、音、义的专书，并且把古典文献翻译成当时的语言，使人们能认识汉字，能通过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古书的意义。于是语文学就应运而兴了。

语文学的产生，在我国历史上渊源很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语文学知识的萌芽。春秋以前，因去古未远，加上书籍不多，人们容易读懂它，因此不可能产生语文学。而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争雄，加之社会矛盾的激化——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革新与奴隶主阶级的保守之间的斗争，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进而影响到知识分子。因此，当时的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学派。学者们出于政治的目的，往往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这在先秦古籍中不乏其例。同时，也有说解某一书的，如《春秋》有左、公、谷三家传；《周易》有子夏传；《墨子》注解《经上》有《经说上》，《经下》有《经说下》（“说”即注解）；《管子》注解《牧民篇》有《牧民解》；《韩非子》注解《老子》有《解老篇》等等。不过，这些注解，有的是理论上的阐明，有的则是以故事来论证，还没有自觉地、充分地注意到字义的训解⁴。战国以后，语文学才真正从一种知识的萌芽逐渐得到发展。

语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一个朝代的政治倾向、政策方针、学术风气以及社会的动乱与安定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语文学的发展。语文学作为一门总的学科，它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从秦代到清末，共历两千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并不是直线上升或下降的，而是有着很强的阶段性的。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兴衰，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兴有衰，有全面发展的，有其中某一门类得到发展的。就发展阶段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

(二)盛行期，(三)中衰期，(四)复兴期。这种分期，是以语文学的内容和语文学在每一个阶段的兴衰作为标准的，因此与历史的分期不同。此外，这种分法并不是绝对的，阶段与阶段之间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一)启蒙期 战国末至西汉末(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在这200多年里，秦王朝的统一和灭亡、刘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秦、汉统治者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使文字、训诂之学得到发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天下以后，为了维护和加强他的统治，采取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颁行“挟书之律”、“焚书坑儒”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焚书坑儒”和“挟书之律”，使古籍大多散佚，就当时而言，阻碍了语文学的发展；就后来而言，又是西汉训诂兴盛的原因之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语文学的发展。改大篆为小篆，隶书的诞生，对汉字的简化和语言的统一不无好处，其作用自不待言。重视文化教育原是秦的传统，远在春秋战国之间，秦国就有《史籀篇》那样的童蒙识字课本，到了秦末，又出现了《三苍》，即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⁵。从此，产生了启蒙期的文字学。

刘汉政权的建立，巩固了封建制度，发展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隶书逐渐代替了篆书，古文、奇字已经成了“古董”，加之去古渐远，古音古义已不被一般人所理解。这些情况，促使语文学发展起来。

文字方面，继秦《三苍》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

《训纂篇》等字书，其内容都是三字、四字或七字一句的韵语，其作用仍然是供童蒙识字。

训诂方面，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一反秦人政策。惠帝除“挟书之律”，文、景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渐出。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因而出现了不少有关儒家经典的注解，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就有百余家，近两千篇之多，训诂之学风行一时。由于对古籍的注解多了起来，就有人做汇集各家注解为一编的工作，于是《尔雅》、《小尔雅》一类的训诂专著问世了，这是训诂学发展的一大飞跃。《小尔雅》不传，今本从伪《孔丛子》中录出；《尔雅》流传了下来，从体例到内容，给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有研究价值，是不朽之作。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西汉末扬雄的《方言》。《方言》一书，较之《尔雅》，同样是一部训诂学著作。其体例同《尔雅》，所不同的是，并非用当时的语言解释古语，而是用“通语”（即当时的普通话）解释方言。《方言》的全称是《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它记录了很多方言词汇；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不仅是对训诂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而且在汉语史，尤其是在词汇史、语音史的研究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书，初步建立了校勘学和目录学的体系，这是因为书籍越来越多的原故。刘氏校书的方法大致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改正错误，补充遗漏，删除重复；（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给分加篇名、书名；（三）撰写内容提要 and 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在目录学上，刘向首创“别录”，歆再创为“七略”。“别录”不传，

“七略”还较完整地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刘氏父子的校勘学和目录学，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1) 文字统一，书写简化，隶书盛行；出现了童蒙识字课本一类的字书。(2) 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注解，训诂讲微言大意，但夹杂阴阳迷信色彩。(3) 产生了通释语义的专著——《尔雅》、《方言》等。(4) 产生了校勘学和目录学。

(二) 盛行期 东汉初至唐代中叶(公元1世纪初至公元七世纪末)。在这700多年里，社会几经改朝换代，而每一朝代的政策，又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语文学的发展。西汉末年，今文学家的谶纬说盛行，把训诂引向了歧途；东汉经今古文学的斗争，古文学的胜利，又使语文学向朴学的方向发展。东汉末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争雄，使部分学者走向“清淡”，而清淡之风的盛行，对训诂是一大打击。六朝时期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用儒、佛、道三家的学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因此，产生了义疏之学。东汉佛学的输入，为反切的产生提供了借鉴的条件。六朝文学的兴盛，尤其是“四声、八病”的学说兴起，使韵书新作大量产生。唐代轻学校重科举，引起了学者对《切韵》的重视，因而为其增字加注者极多。隋、唐人崇尚佛学，因梵语的启发而产生了字母之学。

文字学的发展，东汉以后凡分两途：其一，由于时代的变迁，秦时的童蒙识字课本不易被人理解，于是就有人或是为其作注，或是编纂新的识字课本。自扬雄作《训纂》，班固又续《训纂》为十三章；别有贾鲂的《滂喜篇》。此外，王育替残本《史籀篇》作解说，杜林有《苍颉训诂》、《苍颉故》，

魏张揖有《埤仓》、《古今字诂》，晋郭璞有《三苍解诂》等，大都是《三苍》的补注本。其二，东汉许慎以《苍颉》、《训纂》等篇里的小篆为主，而补以竹简、古文和《史籀篇》，基于六书说而作《说文解字》。许慎是古文大师贾逵的弟子，也是古文学派的健将，他的《说文解字》，正是应经今古文学的斗争而诞生的。《说文》的问世，使文字学向前大跨进一步，字书不再是仅为教学童识字的“小学”，而是探求文字的形、音、义，整理古代典籍的学问。

《说文》之后，又有晋吕忱《字林》、梁庾俨默的《演说文》、陈顾野王的《玉篇》、六朝时佚名的《说文音隐》等，这些著作除《玉篇》外，大都无所发明，不外乎是增字加注，因此都已亡佚。《玉篇》原本也已失传，今传本是宋初陈彭年等的删节本，但唐人所定原本《玉篇》还存残卷。从残本我们可以看出，顾氏之书仍是为《说文》作注的，但其中例证之丰富，却是《说文》所不及的。隋、唐两代没有什么重要著述，仅唐人李阳冰作过刊定《说文》的工作。李氏擅长篆书，但多臆出，他刊定的《说文》错误很多，南唐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中就指出有 50 多处。虽然如此，在《说文》渐趋失传的时候，李氏能为其书篆刊定，却也功劳不小。李氏之后，有李腾（阳冰侄）的《说文字原》，对《说文》的部首作了一些考证的工作。唐代还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二书都是供太学生读儒家经书之用的字典。

还须提及的是汉魏六朝有不少研究俗语俗字的学者，其著述之富，仅《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 30 余家 40 多部，可惜这些书大都亡佚。

此外，东汉以后，书家辈出，篆、隶、真、行、草诸体

大备，给字形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唐代，真楷已成为人们常用的书写字体了。

训诂之学，在这一时期几起几落。由于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西汉末佛教又开始输入，学者们喜用阴阳家的学说解经，用阴阳术数的理论来预决吉凶，出现了谶纬之学，使训诂杂入迷信色彩。西汉的经文有用隶书书写的，也有用古文书写的（古文即籀书）。用隶书书写的叫做今文经，用古文书写的叫做古文经。今、古文经学各有师传，官学中传授今文经学的五经十四博士，称今文学家，民间传授古文经学的学者，称古文学家。西汉末刘歆校中秘书，发现了大量的古文经书，因而开始提倡古文经学，建议官学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但刘歆的倡议遭到了今文学家的反对，于是经今古文学之间开始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古文学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官学中被立为博士。经今古文学的斗争，使东汉成为训诂勃兴的时代，训诂一变而为实事求是的朴学。当时的大家有郑兴、郑众、贾逵、卫宏、许慎、马融、卢植、服虔、郑玄等人，他们有的是专注一经，有的是兼治数经，而注解的重点在研究章句训诂、考证名物制度，大量著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尤其是郑玄，博大精深，遍注群经，治学不主一家，著述之富，时推第一，堪称集经学训诂之大成。

东汉末战争频繁，社会极不安定，许多学者有厌世之感，因而“清谈”之风渐盛，“玄学”之势日兴，竟使训诂之学降为末流。

魏晋以后，学术界儒、佛、道三家鼎立，但又互相影响，加之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麻醉人民，缓和矛盾，大力提倡儒学、佛学、玄